

三十年艰辛探索铸就的重大理论成果： 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雷 云

提 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新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理论，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它的形成历时三十年的长过程。邓小平实事求是地分析当代中国国情是它形成的思想前提和理论基础，八大后一系列“左”倾错误倒逼他从深层次上思考中国社会发展阶段问题，改革开放中“姓社姓资”的无谓争论促成了这一理论的正式成立。邓小平是这一理论的奠基者、首创者和最终确立者。

关键词：邓小平 当代中国国情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总依据

作者雷云，男，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兼浙江省委讲师团团长，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原党组书记兼主席，研究员（杭州 310025）。

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共产党，制定政治路线和治国方略的最根本依据，在于对所处时代的科学判断。时代反映的是一个很长很长历史时期内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和总走向，是社会形态变化的最基本标志。但它在不同发展阶段——尽管它也是相当长的——又有不同的主要特征和主题，即所谓“大时代”中的“小时代”。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开启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时代”，至今未变。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实际上已进入了由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小时代”。可惜我们当时仍然把战争与革命当作“大时代”，由此导致了一系列“左”的做法，直至“文化大革命”时期突出强调“继续革命”、“反修防修”，争做国际共运中坚守列宁主义时代观的典范。

时代还包括国内的最重要特点。1950年代中期三大改造的完成，开启了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这是一个崭新的“大时代”，反映了中国的历史总趋势和总走向，是中国社会形态发展变化的最基本标志，至今未变。但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实际上已进入了由阶级斗争为主线到发展生产力为主轴的“小时代”，可惜我们当时仍然坚持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为纲，纲举目张，“纲就是主题”^①，而把发展生产力放在“目”的地位，甚至谁主张发展生

^①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页。

产力，谁就是搞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以致干了二十年的社会主义，还是“一穷二白”。

本文要探讨的是邓小平对国内“小时代”的思考和探索，他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从酝酿、孕育、形成到成熟的历史轨迹。人们通常以为，这一理论是从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开始才提出的，到1987年十三大正式形成。其实并非如此。综观经中央审核和批准出版的《邓小平文选》、《邓小平文集》、《邓小平传》、《邓小平年谱》等权威著作，可以看出这一理论早在上世纪“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就发端了，到1987年十三大后终于成熟，其间经历了长约三十年的历史过程。

一、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国情是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思想前提和理论基础

早在1939年，毛泽东就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①上述所谓中国的“小时代”，就是要回答三大改造后中国的国情。1956年党的八大对三大改造完成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的中心任务发生根本变化作出的判断，初步回答了这个问题。不幸的是，不久党和毛泽东主要因受苏共二十大和匈波事件以及国内某些政治风波的影响，推翻了八大的正确判断，宣称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始终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并相应地改变党的政治路线，把阶级斗争提到首位，搞“反右派”等所谓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接着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表面看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事实上“插红旗拔白旗”、“割资本主义尾巴”、“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穷过渡”、“反右倾”等带有强烈阶级斗争和“革命色彩”的东西充斥其间。

可见，正确判断国情，首先必须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态度。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曾两次称自己为“实事求是派”，然而终其一生，他也是“实事求是派”。在八大以后党和毛泽东作出脱离中国实际的判断时，邓小平作为党的总书记自然也是积极参与者，但相对地说，他比较冷静、客观、务实，多次指出“心要热，头要冷”，不要一哄而起，不要刮风。比如据《邓小平传》记载，1957年1月，他向清华大学师生作报告，提出要正确认识匈波事件，联系中国实际，指出我国的基本制度是好的，但是还要经常注意调整，承认我们的事业还很年轻，经验不足，制度还是不完善的，重要的是正确的要坚持，错误的要纠正，不完善的要补足；至于具体制度，只要有利于生产，什么制度合适，就采取什么制度。在“反右派”运动中，他虽然也是“积极分子”，但当出现过火现象时，就提出划“右派分子”要非常慎重，警惕斗争扩大化。“大跃进”初期毛泽东严厉指责周恩来、陈云等反冒进是“政治问题”，邓小平认为看不出毛与周、陈之间有什么可以上升到“政治问题”高度的分歧。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刮起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等“五风”极为反感，在书记处会议上屡屡提出批评。对1959年庐山会议把彭德怀等人打成“右倾反党集团”，他认为是错误的。60年代初，他主张要认真总结“三面红旗”的经验教训，宣布“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并在论述怎样恢复农业生产时，提出了著名的“猫论”，指出：总之，是要实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这几年就是千篇一律，等等。这一切，都说明他实际上是在思考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后怎样从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带根本性的大问题。据《邓小平年谱》记载，1975年5月他第二次复出后主持“全面整顿”，指出现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页。

问题的指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个物质基础，不然怎么过渡到共产主义？这同“唯生产力论”是两回事；批“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现在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吗？同年8月，对国务院讨论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就修改这一文件提出七点指导性意见：一是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二是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三是加强企业的科学研究工作；四是整顿企业管理秩序；五是抓好产品质量；六是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七是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所有这些，也体现了他从中国实际出发思考问题的实事求是精神和态度。

1977年十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经过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在一系列讲话、报告中，一再指出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方法的概括，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直到1992年的南方谈话又突出强调：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在此期间，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个精髓和很朴实的道理，对当代中国的实际作了深刻分析。

他关于当代中国的主要特点的论述很多，集中体现在1979年3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中。讲话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解放以来工农业虽有很大发展，但是由于底子太薄，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中国的科学技术力量很不足，科学技术水平从总体上看要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年。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现在全国人口有九亿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就都成为严重的问题。所以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而所谓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个概念的内涵就是“小康之家”。

中国既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小国，这是邓小平分析当代中国实际一直坚持的基本观点。他在1975年2月会见冈比亚客人时就说过：“有人说，好像中国也是一个超级大国。实在不敢当，没有资格。为什么没有资格呢？我们很穷嘛！如果从人口多、地方大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算是一个大国。但是，按经济发展水平来说，我们还是一个小国，所以根本没有资格当超级大国。”^①1976年元旦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女婿时又说：“我们这个国家又是大国又是小国，大就是地方大、人口多，小就是穷、经济落后。”^②1977年10月22日在会见朝鲜友人时指出：“要承认自己落后，特别在科学技术领域里。承认落后就有希望。”^③后来更是反反复复地阐述这一观点，例如同年10月26日会见法国友人时说：“人们都说中国是个大国，其实只有两点大，一是人口多，二是地方大。就发展水平来说，是个小国，顶多也是个中小国家，连中等国家都算不上。”^④又如1984年10月同马尔代夫总统的谈话中说：“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不过三百美元。”^⑤

在政治、思想方面，邓小平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强调民主是解放思想的条件，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发扬民主，提出了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问题。1980年7月接见河南省委负责人时

^{①②③④}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39、227、229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4页。

说：中国封建主义很厉害，这个问题不解决，就要把人推向反面。同年8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关于改革的论述则更多。还在1978年9月听取黑龙江省委领导人汇报时就指出：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总的说来，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同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即提出了改革、尤其是经济方面改革的任務，包括允许一部分地方、企业和工人农民先富裕起来的大政策。

以上论述，涉及当代中国的人民生活水平、生产力和科技发展状况、现代化程度、综合国力、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以及基本体制机制等诸多方面，都是从实事求是地分析当代中国的特点出发而得出的结论，其核心是要敢于正视现实，承认落后。

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邓小平运用它来观察和分析当代中国的最大特点，为正确判断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所处历史方位、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提供了第一个思想前提，奠定了最重要理论基础。

二、党的八大以后的“左”倾错误 倒逼邓小平从深层次上思考中国社会发展阶段问题

党的八大以后的“左”，特别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使邓小平陷入沉思，进而从社会发展阶段的高度来总结经验教训。

1958年11月6日，邓小平赴郑州参加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据《邓小平传》记述，毛泽东提出会议要研究三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是针对当时出现的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界限的错误思想提出来的，即什么叫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什么叫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些过渡需要什么条件，多长时间？另外两个问题是钢指标和城市人民公社问题。

11月7日，邓小平主持有刘少奇、陈云、李富春等中央高层领导人和大区及一些省市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提议先议一议大一点的带原则性的问题和一些政策性的问题。主要是：第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内容是什么？什么是“建成社会主义”；第二，公社问题，包括公社的性质、体制和城市公社问题等；第三，一些具体政策问题。邓小平分别就这些问题谈了自己的观点：关于什么是“建成社会主义”，他一方面也认为就是实现全民所有制，另一方面又针对当时流行的“左”倾观点，指出这需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总要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生产水平，一些农村人民公社急于宣布实现全民所有制，言过其实了，因为那里的生产力水平还很低。关于公社的性质，鉴于当时公社刚刚搭起架子，不少地方就宣布搞“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他明确地说，人民公社还不是共产主义的，连社会主义还没有建成，怎么就是共产主义呢？关于公社的体制，他不赞成陈伯达提出办“一县一社”的特大规模公社，主张采用“联社”形式来解决积累和穷富平衡问题。关于公社的分配方式，他认为现在需要有点差别，不能抛弃经济鼓励的作用。毛泽东在会议上就发展商品生产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

第一次郑州会议实质上是开始纠“左”。会议根据这些精神，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11月28日，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讨论这个草案。12月9日邓小平向全会就草

案作说明讲话时指出，人民公社是一个新问题，不能疏忽大意。目前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对公社的看法是参差不齐，做法也有一些不一致，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有一些不正确的、庸俗的解释，有必要澄清思想，统一认识，端正做法。他还肯定按劳分配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积极作用，供给的范围不宜过宽；在集体生活中应当允许个人有适当的自由，也就是“大集体、小自由”；在兴办公共福利时，个人生活资料永远归个人所有，这一点公开向群众宣布。关于城市人民公社，总的精神是从稳从缓，另作专门研究。全会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一致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当时中央领导层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从实践到理论“左”的错误的初步认识，当然发现错误已经是一个重要进步；也比较集中反映了邓小平开始实事求是地思考中国社会发​​展究竟处于一个什么阶段，应当怎样从这个阶段的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全会结束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造成的许多严重问题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邓小平主持的书记处逐一研究缓解的办法，尤其是钢铁的指标定得太高，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引起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邓小平严厉批评了高指标和浮夸风，指出言过其实是要迷惑自己的，破除迷信就要提倡科学，浮夸风本身不符合科学；我们国家“一穷二白”的形势还没有基本解决，根本改变还差得很远。

毛泽东在视察中发现了第一次郑州会议的决定并未得到贯彻落实，于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专列上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2月27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开会，批评1958年秋人民公社成立以来刮起一股“共产风”，八届六中全会指出的几个界限仍未分清，并就尊重价值法则问题发表重要意见。邓小平多次主持会议，形成十四句话：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这是这次会议的主要成果，成为制止共产风、整顿和建设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方针，标志着纠正“左”的错误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4月2日至5日，在上海召开八届七中全会，是否降低计划指标的问题又被首当其冲地提了出来。邓小平在开幕会上批评宣传部门报喜不报忧，片面宣传风调雨顺，其用意在于敦促把计划定得确实可靠一些。

但是正当全党上下努力纠“左”之时，发生了庐山会议的风波，局面又出现了逆转。1959年8月2日至16日的八届八中全会，把彭德怀打成否定党的多快好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三面红旗”的右倾反党集团首领，人为制造“反右倾”的阶级斗争，会后又把这一斗争扩大到全党，使刚刚取得的纠“左”成效付之东流，“左”倾思潮重新泛滥起来而且愈益严重。

毛泽东这时虽然在一些问题上还是纠“左”，在主要倾向上却希望继续加快“大跃进”，还说不管大城市、中城市、小城市，一律搞人民公社。但受到邓小平的抵制，他仍认为要慎重。此时国民经济面临的严重困难开始暴露。邓小平在书记处会议上说：领导人要清醒，庐山会议“反右倾”以后，把应该接受的教训忘了。作为领导者，不要忘记除了九个指头之外的一个指头甚至于少于一个指头的问题。这一点，我们领导者头脑要冷。我们要热，但是更要冷。在1961年1月4日和5日的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明确提出“要让农民富起来”、“让农户富起来”的重要思想。1月14日至18日，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不得不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来应对严峻的形势。毛泽东提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要求使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研究年，一个实事求是年。

八届九中全会结束后，邓小平即离京赴各地搞调查研究。这时全党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的认识，还是有限的，没有从根本上触及指导思想问题。毛泽东还是认为，党的路线方针是没

有问题的，问题在于缺乏正确的具体的政策。邓小平则进而思考了更深层次的问题。他在同哈尔滨一些干部交谈时说：“今后主要讲社会主义好了。按马克思的说法，我们就是超越了阶段。一切都要按社会主义原则办事，不要再照顾原来说过的话，办过的事，那是照顾不住的。”“我们在社会主义阶段只能搞这样高的，再高了就不行。凡是办不到的，不管原来是哪个人说的，站不住就改，顾面子是顾不住的，今天顾住了，明天也顾不住。”^①这是在邓小平言论中首次出现“超越阶段”的概念，点出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实质。其实这是直接针对1958年8月中央北戴河会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而言的，该决议宣称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当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道路。会后，全国农村迅速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实现了这个“化”。在运动中，“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说法大行其道，有些地方还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要求在三五年内实现以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一平二调”、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为主要标志的“共产主义”，造成“左”倾错误严重泛滥的恶果。1961年1月邓小平在与外宾的一次会见中说：“如果认为我们现在的公社是共产主义的，那就要犯错误了。”“有些同志想搞共产主义，超阶段，这样做的地方都犯了错误”^②。1963年5月同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会谈时更是明确地说：“对社会主义这个历史时期，赫鲁晓夫看得很短，我们认为应该是很长的。在一个国家内可以建设社会主义是肯定的，但在一个国家内建设共产主义是否可能？赫鲁晓夫说生产水平赶上美国就可以达到共产主义。按照马列主义的原则，最终要消灭三个差别：工业和农业的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城市和乡村的差别。这些差别没有消灭，怎么能进入共产主义？看来社会主义是一个独立的很长的时期，这不仅因为有国内因素，还有国际因素。”^③而所有这些，都为尔后正式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作了直接或间接的理论准备。

应当指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毛泽东为了反思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系统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多次强调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并且认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不发达的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后一阶段比前一阶段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可以看作是扣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大门，然而因“左”的指导思想没有根本转变而未能登堂入室加以发挥，形不成系统理论，在实践上依然搞超越阶段的“左”的一套，直至最后酿成“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灾祸。但不管怎么说，这一观点后来成为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一个重要理论源头。

三、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姓社姓资”的无谓争论中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正式形成，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十三大这段时间。

这个理论，说到底是要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在重新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道路过程中，邓小平思考得最多、论述得最精彩、对中国在新时期的发展最具决定意义的，就是这个问题。

据《邓小平年谱》记载，早在1978年2月，他在听取赵紫阳汇报四川工作时指出：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同年6月在同罗马尼亚驻华大使谈话时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总要通过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来体现，这是最起码的

^① 《邓小平传（1904—1974）》（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90页。

^{②③} 《邓小平文集（1949—1974年）》（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5、154页。

标准，空头政治不行。同年9月在鞍钢座谈时说：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最突出的是三中全会后的1980年4月12日会见赞比亚总统时的谈话：“任何革命都是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社会主义总要比资本主义优越，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使经济发展得比较快，人民生活逐渐好起来，国家也就相应地更加强盛一些。在这一方面我们经历了几次曲折。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社会主义要优于资本主义，它的生产发展速度应该高于资本主义。……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①这些话，特别是“对于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现在看来似属平常，但在当时全党还处于严重思想僵化半僵化状况下，却是石破天惊，振聋发聩，需有敢冒巨大政治风险的大无畏精神和被指称为搞“非毛化”修正主义的理论勇气。它实质上是正式提出了对社会主义必须进行再认识，号召全党在马克思主义轨道上重新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同年4月21日会见阿尔及利亚友人时又说：“要充分研究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现在我们正在总结建国三十年的经验。总起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第二，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要讲究经济效果。只有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随之逐步增加人民的收入。我们在这一方面吃的亏太大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十年。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不能因为有社会主义的名字就光荣，就好。”^②这番话是对他在三年困难时期提出的“超越阶段”概念的深入发挥，是对十年“文革”惨痛教训的深刻总结，同时点出了历史上犯“左”的错误的症结所在，提出了坚持生产力标准的思想。其后在同年5月5日会见几内亚总统时还说：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1986年12月14日在会见贝宁友人时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我们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总起来看，这主要就是不完全懂社会主义。因此，我们提出的课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1987年4月26日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时，重申“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承认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在这里，他讲出了中国最广大群众想讲而不敢讲的大实话。

至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命题，已经是跃然纸上，呼之欲出了。

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③。尽管这是从批评否定我国已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基本事实的错误观点的角度而言的，并且还仅仅是一个论点，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1982年9月的十二大报告说，“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④。这是从肯定由于我们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就能够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建立起高度的精神文明的角度，针对那种以物质文明还不发达为借口否认建设精神文明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观点而言的，并且还仍是一个论点，但毕竟也在

①②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19—620、624—625页。

③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8页。

④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页。

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又明确地说“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①。这是从肯定我国在实行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新历史条件下，道德建设一定要从实际出发，鼓励先进，照顾多数，把先进性的要求同广泛性的要求结合起来的角度的，针对在道德建设上可能出现脱离实际搞一刀切的倾向而言的，并且依然只是一个论点，但毕竟同样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

以上三次表述，都是在特定的角度、有限的含义上，分别提出关于我国社会所处历史方位的论点，还不是在总体上和完整意义上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所以虽然不同程度地体现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却未能充分地完整准确地体现这一思想。真正具有转折性的事情，发生在1987年十三大前后。

据著名党史研究专家龚育之在《党史札记》中回忆，早在1986年十二届六中全会前夕，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就曾提出起草十三大报告的设想，希望十三大报告要从理论上讲深讲透，要像毛泽东当年在延安写出一篇《新民主主义论》那样，好好写出一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论》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1987年1月，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由赵紫阳接手主持起草十三大报告。他召集原起草班子讨论，大家赞成还是要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讲透。于是就于3月21日致信邓小平，提出《关于草拟十三大报告大纲的设想》。《设想》说：要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是从我国国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着重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我们所以必须采取现在这样的方针政策而不能采取别的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全篇拟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根据。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般地泛指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的初级阶段，而是特指由中国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必须经历而不能逾越的初级阶段。中国进入社会主义，不是脱胎于资本主义，而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此产生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一系列特点。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不仅与发达国家不同，而且与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同。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设想》还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的两重含义和由此而来的党的基本政策，以及如何防止“左”右两种倾向等重大问题。邓小平于3月25日批示：“这个设计好。”^②邓小平所以说“好”，就好在《设想》比较系统、完整、准确地表达了他的一贯思想，尤其是经历“文革”浩劫后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深邃思考。

1987年10月十三大报告，根据上述《设想》的基本思路，专设一节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这一阶段的时代背景、中国现状、基本涵义、理论依据、历史地位、现实针对性、党的基本路线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全面展开、系统论述，从而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一个论点上升为一个理论。同时，报告还全面阐发了唯物史观的生产力标准理论，指出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强调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或者是社会主义所允许的，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这就破除了离开生产力标准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从根本上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种种空想的界限。

^{①②}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80、1307-1309页。

邓小平给予这一理论以很高评价。1987年8月29日十三大即将召开之际，邓小平在会见意共领导人时说：“十三大归根到底是改革开放的大会。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①十三大以后的1988年6月，邓小平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统时说：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②。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了政治风波。党内外质疑基本路线、特别是怀疑改革开放的声音不绝于耳，“姓社姓资”之争再度掀起。那年5月31日邓小平同李鹏、姚依林谈话说：“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③直至1992年春的南方谈话，再次强调：“实践这个标准最硬，它不会做假。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实来回答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④另据著名学者吴江的记述，邓小平在那年6月的一次谈话中还说过：“如果说把经济建设列为党的基本路线和中心工作，就是走资派，那我就是最大的走资派，而且是走定了的。如果学习和借鉴工业国家的先进管理、先进经验、先进技术，扩大和搞活市场经济是搞资本主义，那我就是最大的走资派。其实，我是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是学资本主义来搞好自己的社会主义。落后、贫穷的社会制度是不能长期生存下去的，是要垮台的。我要请教那些‘马列主义理论权威’、‘经济学权威’、‘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捍卫者’，你们到底读了多少马列的书，研究了多少马列主义理论？为什么不走出圈子看一看整个国家、整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不回顾一下建国以来我们党犯的那些极其严重的错误？”^⑤等等。于此足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重大意义和它在邓小平心目中的特殊地位。邓小平本人对它是倍加青睐、高度评价、始终坚持的。

结 语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构成邓小平理论乃至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一块基石。

1992年十四大报告，首次系统概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的九个方面主要内容，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列为第二。1997年十五大报告，鉴于当时党内外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尤其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许多迷惘和疑惑，再次突出强调统一思想的根本途径是运用这一理论来认识和解释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为这是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的前提。如所周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哥达纲领批判》仅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将分为低级和高级两个阶段，至于低级阶段是否又可分为几个阶段则并未提及，因为这是需要实践来回答的问题。后来列宁把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称为社会主义，把高级阶段称为共产主义，但他对社会主义仅有“初级形式”的、“没有巩固基础”的等提法。1918年他还说过：“在完全摆脱资本主义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上，我们刚刚迈出了最初的几步。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可

^{①②③④}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3、1238、1277、1340—1341页。

^⑤ 吴江：《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构通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3页。

能知道，过渡到社会主义还要经过多少阶段。”^① 列宁去世后的国际共运中，斯大林于1936年就宣布苏联已基本建成社会主义，1939年联共（布）十八大明确提出向共产主义前进的任务。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宣告“这一代苏联人将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赫鲁晓夫还制定了为期二十年的时间表。其后从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虽然一再改口，降低调门，但总的说还是对社会主义发展程度估计过高。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类似情况。所以十五大报告指出：“在党的纲领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概念，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是第一次。……在中国，真要建设社会主义，那就只能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不能从这样那样的外国模式出发，不能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某些错误观点出发。”^② 2002年十六大报告说，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并据此部署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2007年十七大报告，把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式界定为“基本国情”和“最大的实际”，以此作为系统阐述科学发展观和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目标的立论依据。2012年十八大报告强调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并把这概括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恢宏目标和蓝图。

2012年1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重申十八大报告的论断，并且指出强调“总依据”，是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我们不仅在经济建设中要始终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中也要始终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经济总量低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经济总量提高后仍然要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谋划长远发展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日常工作中也要牢记初级阶段。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我们在实践中要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动摇，既不偏离“一个中心”，也不偏废“两个基本点”，把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统一起来，坚决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措施。十八大以来的四年间先后形成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军队和国防建设的新举措，外事工作的新方略等等，无不都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总依据”紧紧相联，息息相关。

总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理论。邓小平在它的发端、酝酿、孕育、成熟过程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是这一理论名副其实的奠基者、首创者和最终确立者。

责任编辑：徐友龙

^①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

^②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